

吴晓铃集



第五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吴晓铃，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著名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家、《金瓶梅》研究专家、著名印度文学专家、藏书家、目录学家、翻译家、博物学家，现代地方戏研究专家、京剧研究家和票友。师从郑振铎、罗振玉、朱自清等名师，为登堂入室弟子，得诸位名师真传。先后任职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讲学印度、美国等地，是享誉国际学界的大学者。

策 划：孟保青
责任编辑：高树海
封面设计：于 越

内容简介

《吴晓铃集》是著名学者吴晓铃教授一生著述精华的结集，共五卷，包括古典小说卷、古代戏曲卷、地方戏剧卷、藏书与目录学卷、散文卷。吴晓铃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为文短小精悍，深入浅出，笔调幽默，富于智慧，哲思睿语令人轻松愉悦，是十分出色的文化散文随笔。

目 录

我研究戏曲的方法	1
杜仁杰生卒新考	8
胡祇通生卒新考	19
关汉卿生卒新考	24
关汉卿里居考辨	31
钟嗣成生卒新考	39
《青楼集》撰人姓名考辨	44
《古剧杂考》序	51
说“俳优非侏儒”	55
说“俳优与新乐”	58
说“俳优不以调谑为主”	60
说“黄公”	63
说“丁仙现”	66
“才人考”辨	76
说“葫芦提”	85
说“罨罨”	90
说“罨罨”补	96
说“白打”	102
说“三十六髻”	106
说“旦”	113
兰茂	127
严廷中	135
《酬红记》及其作者	140

《今乐考证》与《今乐府选》撰集年代考	144
读饮虹簾散曲丛刻	148
目连救母故事演变的研究	159
跋胡适之先生所藏抄本《救母记曲本》	164
《异方便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及其异本	165
说《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	175
《西厢记》前言	192
“春院欣闻闭不闲”	195
关于《西厢记》七事	199
《六十种曲》校点者的自白	204
《六十种曲》纂刻人质疑》质疑	220
从“吕硕园订”的《牡丹亭》谈到考证工作	231
《古本戏曲丛刊》九集序稿	233
《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	244
李玉的《风云会》传奇	251
《红楼梦》戏曲	255
《千金寿》传奇及其作者沈筠	260
《四美记》不是李玄玉的《洛阳桥记》	264
《红楼梦》戏曲补说	269
七宝遥瞻五色莲	273
小议《录鬼簿续编》的作者	278
清代戏曲作家生卒略表	279
《关汉卿戏曲集》编校后记	285
《大戏剧家关汉卿杰作集》前言	296
编订《关汉卿戏曲集》《大戏剧家关汉卿杰作集》外记	302
《关汉卿戏曲集》校勘随笔	305
试论关汉卿的语言	310
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	318
关汉卿活在人民心中	321
看田汉新作《关汉卿》	324
在田汉新作《关汉卿》座谈会上的发言	326

我研究戏曲的方法

我生得晚，不曾从王静安、吴瞿安诸位大师受过教；在大学里念了两年中国文学系，只选修过4学分的戏曲课程，还是在毕业那年。郑西谛先生是我的老师，但他那些有名的戏曲的课程却一个也没有选过，而只听了一课和我现在所走的路子没有十分关系的“文学批评”。现在把这从艰苦中所得来的经验报告出来，我不想自矜这毫无依傍的“独得之秘”，倒是希望读者看了之后加以一番考索；我走错了的途径，诸位干脆绕个弯儿，免得碰壁。如果觉得我的有些方法还不算太荒谬，那就请您试试看，我一定奉陪。有个伴侣陪着，彼此都不孤单，同时也可以抄近道走，省得一个人迷失路途。

讲到“研究戏曲的方法”，我还想把那已经被人喊得烂熟的两个口号再提出来，那就是胡适之先生首倡的：

历史的眼光！

科学的方法！

所谓“历史的眼光”，也就是郑西谛先生所说的“进化的观念”。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应该特别注意到时代的关系和社会的背景，尤其要知道时代和社会是日渐进化的，受了时代和社会的影响而成的文艺作品当然要跟着那风驰电掣的时代的进步而变幻——无论在内容方面或是形式方面。所以，我们与其说唐诗、宋词和元曲，不如说中国韵文的发展在唐代是以诗的形式出现；章有定句、句有定字的诗变为字句参差的长短句是在宋代；到了元代，不同牌调的若干长短句可以依照音律的关系联在一起，并且中间还可以加入散文的成分，这就是曲。由诗变到曲，除了许多外来的影响姑且不谈，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而且是进化的表现。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研究文学，第一可以纠正

传统的说法之谬误，第二可以打倒“古文至美”之迂腐的观念；而最要紧的则是可以观察出一种体制或是一个题材怎样跟随着时代在进步，在变化。让我举一个戏曲上的例子：凡是读过元人王德信《西厢记》杂剧的，一定很赞美他造词炼句的自然、生动而绮丽。然而你若是看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那么就该知道王德信怎样抄袭董氏的词句而加了许多“点金成铁”的删改。不过王氏也有长处，那就是他把叙事体的诸宫调改编成代言体的杂剧。宋代的赵麟曾经用过词中的十阙〔蝶恋花〕叙述崔莺莺的故事，这种叙事体叫做鼓子词，又比诸宫调早了。

〔蝶恋花〕鼓子词的内容故事完全根据唐代元稹的《会真记》传奇文，元稹的《会真记》的内容又受唐代张鹞《游仙窟》小说的影响；这是从王德信的《西厢记》向上推。向下推呢？明代的传奇有崔时珮的《西厢记》，李景云的增补本《西厢记》，陆采的《西厢记》，杂剧有卓人月的《新西厢》。清代的传奇有高宗元的《新增南西厢》，周圣怀的《真西厢》，陈莘衡的《正西厢》，石虎的《后西厢》，程端的《西厢印》，周公鲁的《锦西厢》，杂剧有查继佐的《续西厢》；从清代中叶到现在，几乎没有一种歌曲中不歌咏西厢故事的，没有一种乡土戏里不演唱西厢故事的。有的嫌题材太贫俗了，于是搬搬房子改叫《东厢记》传奇，弹词里有一本《何必西厢》，那作者根本不要房子，连搬场都嫌麻烦了。假如诸位想研究张君瑞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便不应该只抱着一部金圣叹评本的六才子书大加赞赏，你必须从《游仙窟》读起，一直读到《何必西厢》，还应当去听刘宝全的梨花大鼓《大西厢》和白玉霜的奉天评戏《红娘》。这样，才能明了这个故事的体制上的变迁；复次，再根据时代和社会的背景去推求其变迁的因素；然后，你才有资格去批评优劣，因为这时候你的批评有了根据就不会十分歪曲了。

胡先生对于“科学的方法”的解释很简单，只有“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八个大字，这也就是郑西谛先生所说的“归纳的观察”。研究文学史的科学方法虽然用不着试管和显微镜，可是那细致的分析工作却也不下于解剖一只青蛙的内脏，那精密的计算方法也不比求证一个难解的几何图形容容易，那旁搜博征的材料之去取更同于一个化学试验要做上几百次才有结果。还是拿研究戏曲来说吧！最初，你要十分仔细地诵读那部戏曲，连序跋、注释都不遗漏；于是，你发现里面有有破绽的或不

合理的地方了，那就是问题，把他提了出来，搜求证据先破坏原有的不合理的说法，然后再求证正确的结论。例：清代有一部叫做《酬红记》的杂剧，署“野航”作，一般人都说这位野航是女人，因为杂剧的内容写的是女人的故事。我一看这书就觉那些说法不可靠，仔细读完原文，发现里面有两出写的是筠瓢道人点勘曲文的事，于是知道筠瓢道人就是野航，当然不会是女人的。后来翻阅《合肥志》，知道赵对激字野航，著有《小罗浮馆诗集》八卷，《词集》七卷，《杂曲》一卷，《别录》十卷，《野航十三种》等书，而《酬红记》卷首刻有“野航十三种之一”的字样，那么便证明了《酬红记》的作者野航就是赵对激；我又找到《小罗浮馆诗集》一翻，看见里面有几首诗正是写的《酬红记》里面的故事，于是前面的结论越发得到一个坚强的证明。然后我又考求赵氏的生卒年代：《合肥志》说他“咸丰十年擢知县未行，是年冬，捻匪陷城，殉难”，可见他是在咸丰十年死的，不过年龄未详。赵氏的姐姐赵景淑著有《延秋阁剩藁》，赵氏在序上说：“景淑长对激一载，卒于道光元年辛巳，得年二十五岁。”根据这话可以知道赵氏在道光元年是二十四岁，向上推到嘉庆三年便是他的生年；向下推到咸丰十年他的殉难，也就知道他死的时候是六十三岁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应用科学方法研究戏曲史的例子；你必须多读书，懂得版本、校勘、目录、声韵、训诂之学，熟知历史、掌故，然后才能够见到问题有办法想。

听了上面的话，也许诸位以为研究戏曲太难了。请别害怕！那是比较地专门的研究，现在让我告诉你几个研究戏曲的基本工作，我就在做这工作呢！只要诸位对于戏曲有兴趣研究，并且辛勤一点儿，一定觉得很容易的。

研究戏曲的基本工作有三种，第一种是编目录。

版本目录学是研究国学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学问，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在饭馆里要菜，你一定记得菜名多，才能从菜单上挑选好菜吃。现存的戏曲目录书籍有黄文场的《曲海总目》、姚燮的《今乐考证》和王国维的《曲录》。黄书只著名目，过于简略；姚书分类颇多错误，也不足为据；王书最后出，辑录也较广，算是最好的了。但是现在曲籍发现日多，曲录已经不够为我们研究的参考之用；同时不惟错误百出（故马隅卿先生曾为改正增订，全书的错误竟有十之六七），就是其书的编制方法

也不合于我们的理想，所以有亟需重编的必要。我个人的意见以为重编《曲录》的内容必须在书名的下面：记卷数，记出数（或折数），录版本，注藏家，标存佚，还要写一个简略的作者小传，小传的后面附上征引的书目。总之，怎样对于读者方便，我们就怎样做。现在举一个例子给诸位看：

《红拂记》二卷三十四出

存 明万历间富春堂刊本（北平图书馆藏），明玩虎轩刊本（长乐郑氏藏），明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通县王氏藏），明末六十种曲本等。

明张凤翼撰。

凤翼字伯起，号灵墟，江苏长洲人。嘉靖六年生，万历四十一年卒，年八十七。与弟猷翼、燕翼并有才名，时号三张。嘉靖四十三年举人，会试不第，晚年以鬻书自给。（见《列朝诗集》、《明诗纪事》、《近事丛残》、《曲品》、《顾曲杂言》、《三家村老委谈》、《剧说》、《曲论》等。）

我用这种方法已经写成“曲录新编”的散曲部分，共收曲目七百多种，比起《曲录》中的寥寥四十七种已经超出十多倍了。

第二种是写提要。

提要就是记叙戏曲内容的梗概，使没有读过原书的人也可以略知大要，有同于西洋的 Book Review 和近日报章杂志中的“书报介绍”。这类的书，我们有《乐府考略》（大东书局排印本作《曲海总目提要》，误）四十六卷，里面保存了六百八十四种戏曲的提要；《传奇汇考》八卷，里面虽然有二百六十三种提要，但是除去与《乐府考略》重复的却只剩下了七种。五年前，杜颖陶氏辑成一部《曲海总目提要拾遗》也不过多出六十二种罢了。我们有几千种戏曲，提要却只写了七百五十三种，这数目差得太远了。同时，上述的书又时有错误，例如明代屠隆的《修文记》明明是他晚年思想走入魔道时写的自传，而提要上却说是衍述唐诗人李贺被召上天修文的故事，这是多么可笑！所以前人没有写过的，我们补写；前人写错了的，我们另写。这新的提要里应当包括作者传略、内容述概、故事源流演变和作品的评价，关于这，我也曾试着写过几十篇。

第三种是辑曲论。

曲论就是戏曲批评。我们应当把这部分的著作也都搜集在一起。有单行成书的曲论，例如《曲品》、《剧说》、《雨村曲话》等等，应该集在一起；有为某某书中的一部分者，例如《艺概》中的《曲概》等等，应当剔出；有的笔记或文集中附有论曲的文章则应当辑出，别为定一个名目，例如把梁章钜的《浪迹丛谈》里论曲的文字辑出就叫做“浪迹曲谈”。如果这部分工作完成，那么我们便有了一个戏曲批评的大合集了。

这三种烧砖瓦的工作全部完成，我们就拥有最完备的戏曲目录、戏曲内容说明和戏曲批评的材料了，任何人来利用它，都可以建筑成一幢巍峨的屋宇：写出一部像样的中国戏曲史。可是，那个人如果愿意那部中国戏曲史写得更好，他还应该先写一部“曲家生卒年表”和一部“曲家著述志”，前者依照年代次序排列先后，不但曲家生卒先后一目了然，并且可以看出彼此影响的关系来。后者著录曲家其他的著述名目，在研究某某作家的时候，若能熟读他的全部著作，那么对于他的写作背景、思想来源、学识功力、文笔优劣都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在写批评的时候便不会犯时下一般文学史家净说些不着边际的空话之毛病了。

把上面那三种研究戏曲的基本工作做成之后，还可以做三种练习工作。

第一种是辑佚。

这是把那些全书已经失传了而还有零碎的曲文附载在曲谱曲话等书里的戏曲残文辑出的工作。虽然不全了，但是辑了出来尝鼎一脔也是快事。现在南戏已经有了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赵景深的《元人杂剧辑佚》。他们做得都还不够，并且还时有错误，“南戏拾遗”把散曲“现团圆桂轮”当做戏文便是例子。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虽然有人辑过，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发表。明人的传奇与杂剧的佚文则根本不曾辑过。我们想做，还大有可为。

第二种是结集。

这是把体制相同的著作集合在一起的工作。任讷的《散曲丛刊》，卢前的《元人杂剧全剧》，便都是好例子。我们现在可以做金元诸宫调的结集、唐代参军戏的结集、宋代鼓子词的结集。这，都很有意义。

第三种是校勘。

根据不同版本的书籍，对比它们文字的异同，说明其不同的原因，并证明出哪个本子上的字是正确的。就以元人杂剧而论吧，明人臧懋循编的《元曲选》便是一部极不可靠的书，因为臧氏时常主观地去胡乱删改原作。例如《赵氏孤儿大报仇杂剧》在《元曲选》里是五折，许多文学史上都大书特书这是杂剧四折的变例，殊不知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中的《赵氏孤儿》根本还是四折，大约臧氏看到纪君祥竟没有叙述赵武报仇的事，觉得不过瘾，于是不惜破坏元曲的惯例而去“画蛇添足”。又如官大用的《范张鸡黍》杂剧第三折《元和令》有“树挂尽汝阳城外柳”句，这是因为北方人叫树上凝霜做“挂白”的意思，俗谓国有大丧则树上“挂白”，正是加重描写范式送张劭之葬时的悲惨景色，所以下文便说“则这青山一带也白头”。《元曲选》改为“剑挂尽汝阳城外柳”虽然有吴季札的故实做根据，却和原文寓意不合。这种随意增删的地方在一切明人的戏曲选集中多到不可胜数，我们必须根据善本致力恢复原作的本来面目。

这三种练习工作做得熟了，便可以慢慢地做专门问题的研究。戏曲的研究尚在开始时期，许许多多的问题等待着人们来解决：在体制方面，南曲的戏文和传奇，北曲和院本、杂剧和短剧，清代中叶到现在的花部和各地的乡土戏都值得个别加以研究。就以杂剧而论，为什么必须四折，为什么有的又要附加楔子，也都是待决的问题。在格调方面：曲词的联套方法、宫调的异同原由、衬字的增减规律，在在可以考察推求。在音韵方面，“南宗洪武，北问中原”究竟是什么道理？杂剧中每折一定要“一韵到底”为什么缘故？“务头”的意义和解释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呢！在音乐方面：乐器之使用、宫调之规律；南曲之柔靡、北曲之雄壮在音乐原理上的解释，更是富有趣味的问题。在内容方面的问题更多，故事的源流一项便够你研究好几年，从《五代史》的《后汉高祖本纪》到宋人的《五代史评话》，到金初的《刘知远诸宫调》，到元杂剧的《李三娘麻地捧印》，到元戏文的《白兔记》，到明人的《改本白兔记传奇》，到清人的《后白兔传奇》，甚至于到周璇主演的古装影片《李三娘》，一个刘知远的变泰发迹的故事竟是这样的复杂！再以题材的转变而言，从元人的写烟粉、灵怪、公案、传奇、金戈、铁马到明人的写男女

恋爱和名流杂事，到清人的自叙身世和抒发情怀的从叙述到抒情的现象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加以忽视的。在舞台演出方面：宋元舞台的型式、演出的情况、戏班的组织、角色的类分以及服饰、装扮、道具等都还没有人着手整理；我们在十二分迫切地希望能够有一部和《宋元戏曲史》媲美的宋元演剧史写出来。在戏曲的文词方面保存了许多宋元的方言和俗话，如元曲中的“啞呼”是“胡说八道”之意，“花白”是“恶意嘲笑”之意，“歹斗”是“幸灾乐祸”之意是。还有蒙古话，如元曲中称母亲为“阿者”，父亲为“阿马”，小卒为“乜刺”，杀害为“哈喇”等是。还有许多“语言的游戏”：如称妻为“秋胡戏”，称两为“黄金万”，称饥（叶鸡）为“青头田”。这一类叫做“歇后语”，就是举一个成语而说不出最后的一个字，其实那个字才正是要说的字。又如戏曲中的吕洞宾自称是“回道人”，不说“林”而说“二木”的叫做“拆白道字”，拆字的先生便有这一套能耐。还有数不尽的谚语和歌谣，这，研究声韵和民俗的学者也都应该注意。此外，考定作家生卒，推求社会背景与其作品之关系更是要紧的事。清初的吴伟业被迫变节，但从他写的《通天台杂剧》里看来，知道他还隐隐不忘故明。尤侗屡次赴试不第，于是写了《李白登科记杂剧》以泄愤懑，吴瞿庵先生写《风洞山传奇》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随便举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受时代的影响：顽强的作者会反抗，会领着时代跑；懦弱的则只有啜泣和哀诉了。最后，在欣赏方面，我们可以站在新的观点上去对那些文学遗产予以一种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在创作方面，我绝对不主张再利用旧的形式写剧本，不必说杂剧和传奇了，就是用平剧写的《战淞沪》和《战临沂》也都大大失败，一桩感天地而泣鬼神的壮烈史事搬到旧剧舞台上表演所给予观众的印象只是滑稽和可笑而已，岂不糟糕万分！不过，我觉得致力于现代剧本创作的人们能够多读几部旧戏曲，把里面优美而不含毒质的东西选择出来，改变一下，也不见得没有益处。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故事新编》便是最好的例子。

杜仁杰生卒新考

元代雪蓑渔隐夏伯和写了一本《青楼集》^①，它的卷前有朱经的序，序里有几句话说道：

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难识也。^②

按：杜散人即杜仁杰。白兰谷就是以写《唐明皇秋月梧桐雨》杂剧等获与马致远、关汉卿和庾吉甫齐肩的白朴^③，《录鬼簿》说他“号兰谷先生”。关已斋^④则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⑤的关汉卿。据现当代戏剧史研究者的考证，白朴和关汉卿都已经够不上金代遗民的资格了。^⑥那么，剩下的杜仁杰又待如何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进行探讨的课题。

号称“杜散人”的杜氏事迹一直不详，生卒也无可考。《录鬼簿》卷上“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⑦部中著录“杜善夫散人”居第四位，我们才知道他唤做善夫，但仍不详是名是字。钟嗣成称杜善夫是“前辈已死”的人，而《录鬼簿序》作于元文宗图帖睦尔至顺元年庚午（1330），大约杜氏逝于这年以前，是13世纪后期的人。

对于杜氏生平首加注意的人是王国维。他在《录鬼簿校注》里的《杜善夫散人》条下注云：

杜仁杰，字仲梁，又字善夫。济南长清人。^⑧

按：杜氏本传具见《金诗选》卷首《名字爵里录》，《金文雅》卷首《金文雅作者考》，《元诗纪事》卷三，《济南府志》卷四十八《人物》，《长清县志》卷十一《人物——征辟》，《灵岩志》卷二《人物——隐逸》诸书，而叙述不同，繁简各异。应该指出，记载得比较详细的要算《元诗选》三集了：

善夫先生杜仁杰：仁杰，字仲梁，先称善夫，济南长清人。金正大中，尝携麻革信之、张澄仲经隐内乡山中，以诗篇倡和，名声相埒。元至元中，屡征不起。子元素仕元，任福建闽海道廉访使。仁杰以子贵，赠翰林承旨、资善大夫，谥文穆。仲梁性善谏，才宏学博，气锐而笔健，业专而心精。生平与李献能钦淑、冀禹锡京父二人为友善。遗山元好问《送仲梁出山》诗有云：“平生得意钦与京，青眼高歌望君久。”其相契之深可知也。

这段文字还有一些遗漏和晦涩的地方，现在分别为之指出。

遗漏的地方是名字的问题。《元诗选》说杜氏“先称善夫”，《元诗纪事》卷三说杜氏“又字善夫”，那么，善夫是杜氏早年所用的字。他在早年的名字是什么呢？文献上找不到出处。但是，我在山东省长清县郊外发现的杜忱墓碑^⑨解决了这个问题，它透露了杜氏原名之元的消息。之元和善夫是他早年的名和字。这是根据《周易》的《乾卦·文言》里“元者，善之长也”来的。另外，杜氏又号止轩，这也被《元诗选》漏掉了。按：《灵岩志》卷二说：“杜仁杰，字仲梁，号止轩。”胡祇遒《紫山大全集》卷六有《赠杜止轩》和《挽杜止轩》七律二首。王恽《秋涧大全集》卷十六有《挽杜止轩》七律一首，卷十七又有同题七律三首。魏初《青崖集》卷二有《杜止轩词翰》七绝一首。王旭《兰轩集》卷四有《杜止轩先生亲书诗卷》七律一首，卷十有《贺正启上杜止轩》文，卷十四有《祭止轩先生》文。同恕《矩庵集》卷四有《跋止轩先生词翰》文，都足以作为证明。

晦涩的地方是年代的问题。《元诗选》说杜氏在金朝灭亡以后不肯做官，“元至元中，屡征不起”。又说他的儿子杜元素在元朝做到福建闽海道廉访使，而且杜氏由于这个原因还得到封赠。这两件事情的年代都不够明确，现在合在一起讨论。我认为所谓“至元”指的是“前至元”，

这有《济南府志》卷三十九“世祖时，以才宏学博，累征不起”的话可证。但是，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间（1264～1294）以前，实际杜氏就被征辟过的。元好问曾有《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推荐他与王賁、商挺、杨果、麻革等五十四人，说：“窃见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在所有之。圣者之后如：衍圣孔公；耆旧如冯内翰叔献，梁都运斗南；……时辈如平阳王状元纲……济南杜仁杰……凡此诸人，虽其学业操行参差不齐，要之皆夫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⑩癸巳是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1233），也就是元太宗窝阔台即位的第五年，耶律楚材在这时期正居中书，所以元好问给他写了这封信，建言他应该笼络一些“夫民之秀”给新朝廷。大约耶律楚材同意这个建议，元太宗不久就下谕征辟，但是，杜氏拒绝了。蒋子正在《山房随笔》卷二上记下了传闻杜氏拒绝征辟的谢表两联为：“俾献言于乞言之际，敢尽其忠；若求仕于致仕之年，恐无此理。不能为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唯愿学陆龟蒙，拜赐江湖散人之号。”蒋氏是入元的宋人^⑪，所以我们推知杜氏后来的几次“屡征不起”大约都在世祖忽必烈至元初年间。不过，杜氏的儿子元素仕元做到高官，而且给他赚来了“翰林承旨、资善大夫”的封赠和“杜文穆公”的谥号，在这位老而不易其志的杜氏说来，恐怕也要诧为了一件出乎意料而“重违其意”的事吧。所以我觉得当杜氏得到这些所谓荣誉的时候，他一定早已死去，否则他可能会弃之若敝屣的。按：《灵岩志》卷二《人物》里的杜氏本传说：

元世祖闻其贤，与大臣议以翰林承旨授公，累征不就；乃优游于灵岩五峰两名胜而终焉。武宗追谥文穆。^⑫

这段文字不单可以证成我在前面的假设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前至元，而且根据《元史》卷八十七《志》第三十七《百官志》第三里的“翰林兼国史院：秩正二品。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六年，置承旨三员，学士二员”的话，可以知道元世祖忽必烈初征杜仁杰的时期最早也只能在至元六年己巳（1269）。另外，说是“武宗追谥”，那就说明了杜氏是在死后受到封赠的，并且他的卒年也可以限制在元武宗海山至大（1308～1311）之前。杜元素做到高官也是在这个时期。

我把杜仁杰的生卒年代假定如下：

金章宗完颜璟泰和元年辛酉(1201)顷生，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癸未(1283)顷卒。寿逾八十。

这个假定是有一些文献作为依据的。我曾经搜集不少有关杜氏和他的朋辈的资料，又从宋元间的故籍里辑得杜氏的诗文若干篇，写为一个年表，将杜氏事迹之可以考见的系之以年，于是得到上面的假定。现在把这个年表写在下面，杜氏的生平也就足以略窥端倪了。

金章宗完颜璟泰和元年辛酉(1201)

杜仁杰约生于此年。

按：宋理宗赵昀端平二年乙未(1235)杜仁杰与元好问同游济南。时为金亡后一年。元氏四十六岁。以年齿论，杜氏较元氏为少，然二人行辈相当，交谊亦厚，相差不会甚多。姑且假定杜氏时年三十五岁，则溯其生年当在此年左右。

考胡祗遹逝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年癸巳(1293)^③，而《紫山大全集》卷六有《挽杜止轩》七律一首；杜氏又曾于至元二十年癸未(1283)撰《谷山寺碑》。(说见后)是杜氏之逝当在至元二十年至三十年之间。胡氏挽诗有句云：“八十康强谈笑了，一襟收我泪沾巾。”知杜氏在世八十年，姑定杜氏逝于至元二十年，回溯至此年约为八十二岁，去事实或不甚远。

金宣宗完颜珣贞祐四年丙子(1216)

杜仁杰约十六岁。父杜忱卒。

按：长清县治东北八里许杜氏莹地现存《故金京兆府尹杜公墓志》碑称杜忱卒于此年。

金哀宗完颜守绪正大二年乙酉(1225)

杜仁杰约二十五岁。与元好问初识于河南开封。

按：元好问《去岁君远游》诗又题为《送杜仲梁出山》，有“忆初识于梁王台”句，即指此年二人在汴相识之事。

金哀宗完颜守绪正大四年丁亥(1227)

杜仁杰约二十七岁。隐于河南内乡，时元好问为内乡令。

按：元氏《长庆新泉记》云：“邓之西百里而远，是为内乡。内乡东鄙

有山焉。……正大丁卯，余承乏是邑。”又《张仲经诗集序》云：“及予官西南，偕杜仲梁就予内乡。”

又按：《元诗纪事》卷三云：“麻信之、杜仲梁、张仲经，正大中同隐内乡山中，以作诗为业。”亦系引自元氏文集。《元诗自携》卷一载元氏《西斋夜宴》七律一首，注云：“时为内乡令……叔能、言之、张、杜诸人皆至，而麟之独不来。”张、杜即指张仲经及杜仁杰。

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元年壬辰(1232)

杜仁杰约三十二岁。蒙古兵渡黄河，游骑至汴城。杜氏自内乡北渡避乱。其《病中忆坦夫兄》诗有句云：“共脱壬辰乱，他乡见愈亲。”可证。又，杜氏于至元三年丙寅(1266)撰《东平张宣慰登泰山碑》云：“予自壬辰北渡，三十余年。”亦指此年而言。

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癸巳(1233)

杜仁杰约三十三岁。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推荐杜氏等五十四人，元太宗窝阔台即有征辟之谕，杜氏不受命。

按：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九有《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荐杜氏等人。时耶律楚材任中书官。

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三年甲午(1234)

杜仁杰约三十四岁。三月，金亡。

元太宗窝阔台七年乙未(1235)

杜仁杰约三十五岁。与元好问同游济南。

按：此年系宋理宗赵昀端平二年，亦即金亡之次年。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四《济南行记》云：“初至齐河，约仲梁具东。”又云：“乙未秋七月，予来河朔考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辅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元氏又有《泛舟大明湖(待杜子不至)》诗及《济南杂诗》十首。

元定宗贵由二年丁未(1247)

杜仁杰约四十七岁。撰《真静崔先生传》。

按：崔真静，讳道演，字元甫，修真于五峰山得道。羽化年月未详，然知其俗寿八十一。杜氏所撰传末称“碑刻于丁未上元，为定宗二年，距真静之化已二十七年矣。”则真人当化于金宣宗完颜珣兴定五年辛巳(1221)。

又按：此传本文载《长清县志》卷十三，《金文最》卷五十七及《道